

帛书《黄帝四经》的文德思想

徐莹

文德,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领域,一般指儒家的礼乐教化,如《论语·季氏》所说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儒家的礼乐教化是基于人类自身的性质和特点,由血缘亲情之“孝”升华、提炼出“仁”及“仁者爱人”的道德情感和精神品质,以此建立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君仁臣忠的理想社会。这是一种人道主义的王道政治。与这种人道主义的王道政治不同,道家提出过一种天道主义的文德思想。以帛书《黄帝四经》为代表的黄老道家,将自然规律奉为圭臬,主张君主治国应当遵循自然法则,效法天道之文德,去养和教化民众。

《黄帝四经》的《名理》篇曰:“道者,神明之原也。”帛书将各种各样的奇妙事物,如高层次的认知能力等,都归本于“道”这一最高本体。但相对于老子“恍兮惚兮”“唯恍唯惚”(《老子·二十一章》)的道体本身,《黄帝四经》更关注天地间日月星辰、春夏秋冬在永不停歇的更迭变换中所展现出来的自然规律。这些自然规律具有法则性,是帛书反复论述的天道,如《论约》篇的“始于文而卒于武,天地之道也;四时之序,天地之理也;日月星辰有数,天地之纪也。”

日月星辰总是此起彼伏地周行不已,其循理运动具有固定的轨道和周期;四时之中的春夏秋冬,也总是毫无差池地交替而至,其更迭转换也具有恒定的节序和度数,这些都是自然界的常理和纲纪。而该篇所说的“始于文而卒于武”,则是在具体指陈天地开辟、万物生成之后,自然界以春夏之长养为开始,以秋冬之肃杀为结束的四时之序。这种始于春而终于冬的四时之序既显而易见,又固定不变,《黄帝四经》通过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将其总结为天地中所昭示的法则——“天地之道”。在帛书中,“文”通“德”,“武”通“刑”,《论约》篇“始于文而卒于武”的天地之道,也在《观》篇被表述为:“春夏为德,秋冬为刑。先德后刑以养生。”天道养育万物的方法是以春夏的长养在先,而后才继之以秋冬的肃杀。春夏的这种长养,便是上天施予万物的文德。在自然规律的统御之下,君主治国遵循“始于文”的天道,也在每一年的春夏时节广施恩赏,用“以德为先”的方式养

育民众,这是君主施予万民的文德。在帛书《黄帝四经》中,文德这一概念上在于天、下在于人,具有天与人的两层含义:在天的层次上,文德指天道生养和增益万物的自然之力;在人的层次上,文德指君主抚育和教化万民的恩惠德政。

这种恩惠德政的教化,是一种取法并再现天道的怀柔之术。在自然界中,春夏以和煦温暖的雨露轻风滋润着万物从萌芽开始,不断地生长。所谓“圣人巧,时反是守。优未爱民,与天同道”(《观》),帛书说圣人治国并没有什么机巧,不过是谨守恒久恒常的天道而已。天道以文德养育了万物,因此,《黄帝四经》认为,君主治国也要“春夏为德”,与天道同步而行地施恩于民。具体而言,帛书的文德之治,在于“年度”为循环单位的政策法规之上,是君主效法“春夏为德”的自然规律,因应春夏时节的盎然生机,“省苛事,节赋敛,毋夺民时”(《君正》),以各种惠政鼓励民众努力耕作,如减省繁苛的政事、适度减免赋税、不兴发徭役耽误民众的农时等。若是在夏季大兴土木,征发徭役修建宫殿、城池,则被认为是断绝天理的行为,必然遭到诛罚,《亡论》谓之:“夏起大土功,命曰绝理。”此外,在长期的国家发展战略上,君主也要因循自然法则的以德为先,如《君正》篇的“七年之政”。

“七年之政”旨在用七年的时间打造一个强盛的国家。在“七年之政”的前三年,君主对民众施以文德的恩惠:“一年从其俗,二年用其德,三年而民有得。”即第一年遵从民俗,以此顺应民心;第二年选用贤人为官,以此勉力民众奋进;第三年开放山泽并减税,以此增加民众的收入。经过前三年的广施恩赏,在发展生产、增强国力并获得民众拥护之后,从第四年开始,君主才发号施令、行刑罚罪,并在后三年里持续使用武力 and 刑罚使民众敬畏并臣服。经过六年恩威并施的养育和训诫,第七年,民众便会从令如流,国家也将富裕强大,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帛书的文德是施恩于民的文治和德政,但无论是“七年之政”的前三年施德、后三年用刑,还是“春夏为德,秋冬为刑”“始于文而卒于武”,《黄帝四经》对文德的

论述,常与武力相提并论。这是因为,帛书继承了老子等原始道家相反相成的对立统一思想,认为事物是在其对立中获得的确立和发展的,所以,其文德思想与儒家的重德和法家的重刑均有所不同,特别强调用刑杀与文德进行配合。

对文德应与刑杀配合使用的强调,也源自天道。《四度》篇曰:“参于天地,合于民心。文武并立,命之曰上同。”《姓争》篇亦言:“天帝皇皇,非刑不行;缪缪天刑,非德必倾。刑德相养,逆顺若成。”君主治国,一要参于天地。天地之间是天德和天刑的相互依养:当冬季进入严寒阶段,刑的肃杀之气达到鼎盛,天地同德的长养之气便开始萌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德的力量逐渐积累、增加,刑的力量慢慢衰落,万物在暖春炎夏中成长起来。正是严寒积久的肃杀酝酿和滋养了春的生机,刑由此向德转换。反之亦然。这也就是《观》篇所说的“赢阴布德”“宿阳修刑”,自然界的天德和天刑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君主治国,二要合于民心。人类作为自然的一分子,民心原本也属天道之自然。合于民心的治理方式是顺应人类的天性,先以文德之惠政满足人们在饮食和生育等方面的基本生存需求,然后再用刑罚武力进行匡正,使民心最终归于正道。“天帝皇皇,非刑不行”,如果没有刑罚的配合,君主只是一味地施加恩赏,其统治是无法维持下去的。《兵容》篇说“天固有夺有予”,天道本来就是有生有杀、有剥夺有赐予,因此,人道中的文德也必须与刑杀相互配合、兼行并重。唯有如此,君主的统治才能称得上是获得民众广泛拥戴的“上同”。

尽管帛书“一立一废,一生一杀”(《论约》)的文武之道强调文与武、刑与德的兼行并重,但天道对万物的养育和成就,还具有“曲成”的灵活性,《六分》曰:“唯王者能兼覆载天下,物曲成焉。”“物曲成焉”是说天道及其运动规律虽然永恒不变,但是,天道成就万物的方式却是因事而变的,即根据事物自身的特性使用不同的措施,去应对纷繁复杂的万物,以此令万事万物都能够各得其所。这种“曲成”万物的灵活性,体现在文武之道上,是帛书针对农业生产和讨伐敌国这两件具体事物

自身的特点,将文与武的配比,向文德一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倾斜。

在农业生产上,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收获的是春夏勤劳耕耘的成果。金秋的收获是春夏之德的延续,因此,《论约》篇将原本属于刑杀的秋季并入春夏,合称为“三时”,将“春夏为德,秋冬为刑”调整为“三时成功,一时刑杀”(《论约》),增加了文德的比重。在讨伐敌国上,《四度》篇说:“因天时,伐天悔,谓之武。武刃以文随其后,则有成功矣,用二文一武者王。”以天时为行动准则,在成功讨伐了那些违背天道、罪当灭亡的国家之后,其主要用两份文德配合一份武功去安抚敌国的民众,如此这般地倍施文德,才能够征服人心,取得兼并战争的真正胜利,成为天下的王者。不过,帛书在农耕和伐国上对文德的倾斜和侧重,一方面显示出其王道主义的思想基调;另一方面,这也只是对待特殊事物的特殊方法,并非具有普适性的一般原则。帛书《黄帝四经》文武治术的一股原则,还是用一份文德与一份武功相匹配的“一文二武”。

以帛书《黄帝四经》为代表的黄老道家,是战国时期最为显赫的几大思想学派之一。在时代风起云涌的变法大潮中,商鞅等法家重刑尚力,以强制手段驱使民众从事耕战,实施以力服人的霸政。以力服人者不用德政,但同时期的儒家和黄老道家,却都本着王道主义的政治理想和治国理念注重文德,认为文德应优先于刑罚。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儒家人道主义的王道政治中,文德是一种以人心人性为基础,也以人心人性为目标的礼乐教化,致力于将人们内心孝亲的血缘情感培养成爱人的道德情感;而黄老道家则以天道为旨归,极力使人间世事符合天道的自然规律和法则,以此重建崩坏的社会秩序,其文德是一种由天道推行出的施恩行赏的政治制度。这种落实为政治制度的文德思想具有辩证法的理论基础和宇宙论的广阔视野,是民族智慧的结晶,凝聚着民族精神的特质。它与百家之学共同组成了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作者系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史学月刊》编辑部编辑)

怎样做到坚持问题导向

冯继康

严峻复杂形势造成的不稳定不确定性,自身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等。整体上看,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推进高质量发展还有许多瓶颈。这些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重点问题,必须下大力气着力解决。新征程上,我们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这个“硬道理”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敢于直面和破解障碍挑战,做好工作预案和应对措施,找准化解矛盾问题的着力点,不断塑造新的竞争优势。

基础在深入研究问题。面对各式各样的问题,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善于从个性问题中寻找共性问题、从杂乱的问题中把握要害问题、从问题的趋向中洞悉问题的转变。毛泽东同志指出,对于通过调查而了解到的情况,必须加以研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研究很重要,只有通过研究,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剖析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一系列问题,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之“的”,在深入分析思考上下功夫,善于抓重点、抓关键,从事关改革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出

发,从涉及最多数人核心利益的问题出发,牵住“牛鼻子”。现在,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集中体现在发展的质量上。过去那种靠拼投入、拼资源、拼环境实现高速增长的经济方式已不可持续,亟待转变。我们要深入研究如何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内在统一来把握发展、衡量发展、推动发展,把发展质量问题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从解决“有没有”转向解决“好不好”,着力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加快实现以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质量变革,从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需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关键要勇于解决问题。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在问题分析透彻后还要勇于寻求问题的解决办法,要跟着问题走、奔着问题去,把解决问题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只要科学地认识、准确地把握、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把我们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当前,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面对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诸多因素,必须深入学习和领会“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这一规律性

认识的深刻内涵,并贯彻落实到经济工作各领域全过程,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心和定力,坚持按照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要求解决矛盾、破解难题、化解风险。党的二十大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基本路径。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把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始终坚持质量变革第一、效益优先,大力增强质量意识,以高质量为追求;必须坚持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快形成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必须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必须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发展成果不断转化为生活品质,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作者系山东大学党委书记)

把全面从严治党贯穿干部教育培训全过程

汪建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站在事关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高度,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永远吹冲锋号,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新修订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重要思想,适应新时代对干部队伍的新要求,为推动新时代干部教育培训高质量发展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新举措,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整合原条例中涉及罚则的内容,“纪律与监督”单独成章,为坚持从严治党校、从严治教、从严治学,把全面从严治党贯穿干部教育培训全过程各方面,提供了党内法规依据和基本遵循。

压实各类执行主体责任,把严的要求贯穿干部教育培训始终。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能不能不断培养出优秀领导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政党、这个国家的兴衰存亡。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干部教育培训是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办好干部教育不仅是干部机构的责任,更是全党的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及其主管部门必须把干部教育作为“分内事”放在心上,落实到行动上。参加教育培训,不仅是干部的权利,更是义务。为此,《条例》明确党委和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干部所在单位 and 干部本人等各类执行主体的责任,强调运用领导班子考核、巡视巡察和选人用人专项检查等问责利器,更好地强化和督促干部教育培训的各类执行主体严格执行本《条例》的政治责任,确保全面从严治党贯穿干部教育培训的全过程。

明确主管部门和主办单位责任,全面落实严以治校。党校和干部教育培训机构不同于一般的培训机构,是传承党的精神血脉的殿堂,必须凸显“政治机关”属性,坚持从严治党校永远在路上,一切教学活动、一切科研活动、一切办学活动都必须遵循最严格的政治标准、学术标准、教学标准、管理标准,克服理论教育学用脱节、党性教育针对性实效性不强、对待学员重服务轻管理等问题,努力发挥正风正气的“净化器”、党性锻炼“大熔炉”、全面从严治党“风向标”作用。

干部教育培训主管部门、主办单位必须把严的要求落实到办学治校全过程,确保干部教育培训不走调、“不变味”。《条例》明确干部教育培训主管部门监督管理责任和措施,通过细化干部教育培训主办单位和培训机构的罚则规定,进一步强化了主管部门和主办单位严以治校的责任。

明确干部教育培训教师的责任,全面落实严以治教。从事干部教育培训的教师是党的创新理论的“布道者”,是党性修养的“先行者”,必须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崇高的师德师风。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党校和干部学院的教师要明确自己肩负的神圣责任,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和政治历练,把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挺在前面,潜心治学、虔诚问道、悉心育人,努力成为名家名师。

在干部教育培训的具体实践中,如果教师政治意识不强、业务水平不精,就会严重影响干部教育培训质量。《条例》第三十七条对教师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这是每一位从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教师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和努力目标。《条例》明确教师的罚则规定,目的在于全面落实严以治教的责任,建设一支政治强、信念坚、业务精、作风正的高素质干部教育培训教师队伍。

明确干部参加教育培训的责任,全面落实严以治学。我们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干部队伍建设关系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和人民生活幸福,领导干部不仅要政治过硬,还要本领高强。干部教育培训必须政治训练贯穿干部成长全周期,把党性教育贯穿教育培训全过程,积极营造学习之风、朴素之风、清朗之风。

一方面,教育培训机构要严格管理,为学员创造安心“学”的环境。严格执行《干部教育培训学员管理规定》,对学员实行科学规范的流程管理、自主管理(设立班委和小组长)等制度,坚持以一贯之学、以一贯之学。另一方面,教育引导学员增强参训的纪律意识,提高认真“学”的自觉,克服自由散漫的思想,真正从领导干部的身份转换为学员角色,静下心来“读著作”“冷思考”。《条例》对干部未履行教育培义务和参训期间违规违纪作出具体的罚则规定,为做到严以治学,更好地落实干部教育培训的量化指标和质量要求提供了制度依据。

《条例》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对干部教育培训切实做到严以治校、严以治教、严以治学指明了方向,但是要让制度“长牙”、让纪律“带电”需要各方面全面贯彻落实《条例》,为培养造就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力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共同努力。(作者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副院长)

发挥乡村工匠名师优势

王琳

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关于第一批乡村工匠名师拟认定名单的公示》,拟认定首批共273名乡村工匠名师。评定乡村工匠名师既是为了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乡村文化振兴,也是为了激发乡村工匠队伍活力,带动农民稳定增收,促进乡村产业发展。

所谓乡村工匠,主要是指县域内从事传统工艺和乡村手工业,能够扎根农村,传承发展传统技艺、转化应用传统技艺,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和农民就业、推动乡村振兴发展的技能人才,主要分布于刺绣印染、传统建筑、金属锻铸、剪纸刻绘、陶瓷烧造、文房制作、漆器装饰、印刷装帧、器具制作等行业领域。

乡村振兴是一篇大文章,需要各类人才来书写,既需要善经营的“农创客”、懂技术的“田秀才”,也需要能工匠、懂艺术家等,我们理应重视并引导好、利用好乡村工匠的优势,做好政策支持、制度设计,给他们提供发展的舞台。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乡村工匠又该如何发挥自身特长优势,更好助力乡村振兴?

立足传统工艺,在“特”字上做文章。不同的乡村,历史各有特点,文化各有特色。剪纸刻绘、陶瓷烧造等传统技艺技能,

是许多地方具有代表性和吸引力的特色标识。乡村工匠可凭借自身技能和资源优势,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地方产业资源禀赋,有针对性、有侧重地培育相关特色产业,有意识地将传统技艺与现代化大市场相连接,推动传统手工艺从小作坊发展成为大产业。

注重融合发展,在“新”字上下功夫。乡村工匠需注重把传统技艺和新时代的生活审美结合起来,做出更多适合当下场景的创新,增强乡村手工艺的生命力与市场适应力。同时,乡村工匠还需要提升“互联网+”思维,利用短视频、直播等方式,展示传承久远的手工技艺,助其从小圈子逐步走向大市场。

发挥引领作用,在“带”字上见成效。乡村工匠熟悉当地状况,拥有一定威望,具备带动一方乡亲致富的潜力,这就需要他们积极融入当地生产生活,把相关技艺传授推广给更多农民,带着农民干、帮着农民赚,带动更多农民共同走上致富道路。

当下,农村不仅是充满希望的田野,更是干事创业的舞台。期待更多乡村工匠名师脱颖而出,在广阔乡村施展才华、大显身手,传承传统手艺,繁荣乡村产业,更好地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擦亮文化底色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钟恢万

文化振兴既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又是引领乡村振兴的铸魂工程。擦亮文化底色助推乡村全面振兴,要传承发展农耕文化,增强乡土文化认同,聚焦公共文化建设,丰富乡村文化生活;发展壮大文化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传承发展农耕文化,增强乡土文化认同。农耕文化作为特有的文化符号,是乡村的独特资源,特别是其中蕴含的一系列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等,能够起到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的重要作用。一方面,传承好农耕文化。科学合理规划乡村建设的历史文化保护线,着力保护好文物古迹、传统村落、民族村寨、农业遗迹等各类乡村物质文化遗产,妥善进行修缮修复,让有形的农耕文化留得住、看得见,建设有农耕文化印记和美乡村。同时,通过出台扶持政策、加大资金投入、注重人才培养,不断加大对农耕技艺、节庆习俗等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力度,让活态的农耕文化传承下去。另一方面,发展好农耕文化。要通过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加大对农耕文化的宣传和传播力度,让农民群众进一步了解和认识乡村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更深一层感悟农耕文化的独特魅力,牢记文化符号,厚植乡土文化意识,不断增进对乡土文化的思想认同、情感认同和价值认同。同时,鼓励和引导相关科研院所加大对农耕文化的挖掘、研究和阐释力度,从不同视角、不同维度,深入探寻农耕文化的历史脉络、发展变迁和未

来走向,尤其注重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激活农耕文化中的优秀因子,赋予农耕文化新的时代内涵,让农耕文化“活”起来。

聚焦公共文化建设,丰富乡村文化生活。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滋润人心、德化人心、凝聚人心的重要工作,通过积极引导农民群众追求美好精神文化生活,全面提升他们的精神素养,源源不断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一方面,完善公共文化阵地建设。公共文化阵地是农民群众开展文化活动的最重要平台和有效载体,加大农村文化建设和资金投入,稳妥推进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创新农村公共文化阵地建设模式,鼓励和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建设农村文化设施,实现文化资源共享。切实提升乡镇综合文化站、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服务功能,因地制宜推进乡村文化广场、农家书屋建设,统筹利用好乡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点)等现有阵地,打造地域特色明显的文化传承阵地。另一方面,推动公共文化惠民建设。通过“送”文化下乡,深入开展各类文化惠民活动,让广大农民群众共享文化发展红利。着力丰富文化产品供给,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惠民活动,持续为农民群众提供看得见、听得到、可感知、可分享的优质文艺演出和文化服务。全力打造品牌文化服务项目,积极组织开展广场舞等农民群众喜闻乐见、广泛参与的文化活动,让他们走上乡村大舞台,成为乡村文化活动的组织者、参与者。

(作者单位:江西省社会主义学院)